

從《蘭亭序》的真偽論及六朝士族的避諱

祁小春

一·緒言

《太平御覽》三六二引何法盛《晉中興書》：

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導欲出王舒為外援，及更拜為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三千石。舒上疏以父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鄣〔原註：古會切〕。舒不得已就職。

《晉書》卷七十六王舒傳也有相似記載。這條資料告訴我們：王羲之的堂叔伯父王舒被朝廷任命為會稽內史時，曾拒絕赴任，要求改授，理由是會稽地名犯其父王會諱。朝廷當時議論，勸說王舒：此“會”非彼“會”，字音不同，並無大妨。王舒則認為字音雖異字本同，堅決不肯讓步。後來朝廷居然妥協了，為了王舒特意破例把會稽改成“鄣”稽，使之音形皆異。儘管如此，王舒還是很不情願，但終於無可奈何，“不得已就職”。後來其子王允之（王羲之堂兄弟）也被授會稽之任，他亦以如其父同樣的理由堅決拒絕，要求改授。（王舒父子的例子還將在下文詳論）

因此我不由得想起《蘭亭序》文中“攬”字來了。若其中“攬”字是避諱字的話，那麼王羲之怎麼就能與他堂叔伯父和堂兄弟不一樣？居然能在自撰文中主動以“攬”代“覽”，甚至比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改後的“攬”與“覽”仍然是同音字而王羲之竟然不嫌。疑惑既深，百思未能得其解，嘗撰文以質疑，⁽¹⁾初步提出了筆者的疑問。

本文在前文基礎上，結合古代避諱學及中古避諱實例，分析歸納，力求對《蘭亭序》避諱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眾所周知，在魏晉，士族名士頗放浪不拘禮節，並競以此為時尚。而當時又恰恰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拘講禮儀的時代，這只要看看《通典》中議論禮節多為晉人即可見其一端。怎樣看待這一

矛盾現象？研究方法可以是各種各樣。我近年主要致力於王羲之以及東晉貴族生活文化的研究，所以本文探討之目的也並非僅在質疑《蘭亭序》真偽，頗愿借此機會，由此及彼，使此研究的某一觸角能深入到魏晉士族生活的某一細部，從而藉以展現出一個士族生活中所謂“講禮氛圍”的場景來，並據以做考察與分析。因此，本論中說諱禮的文字篇幅也許顯得較多，這也都是為此目的服務的。總之，本論所得雖淺，聊以獻芹，一家之言，謬誤在所不免，期望得到有識者指教並正謬。

二·關於避諱字“攬”

《蘭亭序》（指傳世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的各種臨摹本以及刻帖拓本）文中“攬”字凡二見，即“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與“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傳世臨摹本及刻帖本文。唐修《晉書》王羲之傳所錄文已改回作“覽”）。梁劉孝標《世說新語》⁽²⁾企羨篇三注引王羲之《臨河敘》文中無此二句。又遍檢傳世右軍詩文尺牘，亦不見此字。王羲之曾祖父名覽，故通說以為《蘭亭序》文中“攬”字乃右軍為避其先祖家諱，以手字旁之“攬”代覽而為用⁽³⁾。此說果然成立否？似從未能引起學者注意。我以為正因為《蘭亭序》中有此“攬”字，反而令人生疑，以至其真偽問題又不得不重新議論矣。

在進入討論以前，我們可以先把問題聚焦在某一點上，然後對由此而引發出來的諸連帶問題逐一分析。問題點是：《蘭亭序》“攬”字究竟是不是避諱改字？

一，如果“攬”字不是避諱，那麼此字是誰寫的？是王羲之隨手寫出來的別字？還是後人妄加？接下來的問題是：若是後人妄加，則《蘭亭序》是局部被人動過手腳還是整篇全出於偽造？

二，如果“攬”字是避諱，那麼這種避諱方法是否符合當時的避諱習慣？如果符合，與傳統說法合轍，則《蘭亭序》確實可信；如果不符合，《蘭亭序》出於後人偽造的可能性就無法排除。

關於《蘭亭序》的“攬”字究竟是不是避諱改字的問題，如前所述，“攬”為改字乃通說，對此還從未有提出過疑義。然而我們從對古人避諱禮以及魏晉人當時犯諱實例的考察來看，魏晉士大夫犯諱多止於其祖，犯到曾祖諱的實例很少見（本論以下將詳細論述）。儘管在性質上犯諱與避諱不同，其犯諱

例本不具有普遍性，因而沒有記錄下來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以東晉瑯琊王氏家族而言，循守五世親盡的古禮治家似乎也符合常理。但是，因為畢竟還沒有更直接有力的證據證明魏晉士族的諱禮親盡於五世，所以三世即遷祧之可能性依然無法排除，也就是說，王羲之不須要避曾祖王覽之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⁴⁾基於此論，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在討論“攬”為改字這一通說之前，應該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為此首先要對下面兩個問題做討論分析：

問題一：“攬”如果不是避諱改字，那麼《蘭亭序》中“攬”是誰寫的？為何要這樣寫？可能性有二：第一種可能是王羲之本人信手寫上的。儘管有人說過“右軍書多不講偏旁”⁽⁵⁾，但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如果不是為了避諱而隨意加了偏旁的話，會致使《蘭亭序》文義不通（下文有詳論）。另一種可能就是後人妄加。觀傳世《蘭亭序》諸帖，“攬”字的寫法確實有點特別，提手旁都顯得略小，不能排除後人後來加上的可能性。若然，則《蘭亭序》就可能是一個半真半假的東西。⁽⁶⁾然而後人是出於甚麼目地而妄加的呢？僅僅是在局部做了手腳，還是整篇皆出於偽造？我們說，妄加的動機無非是出於偽造，目的無非是欲使人相信其出右軍之筆。然而如果右軍真的不用避諱而書寫了“覽”字，那麼後人替他補加手提旁的可能性幾近於無。因為《蘭亭序》既然為右軍真筆，畫蛇添足去改動真跡之字、以讓人信其為真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是謂其局部做過手腳似於理難通。“攬”字既為妄加，則全篇皆出於偽造的可能性就極大。因此筆者對《蘭亭序》“半真半假的”的看法尚持保留意見，在此提出獻疑，以俟再考。

問題二：“攬”如果確實是避諱改字，那麼王羲之會不會這樣改寫呢？這種避諱方法不符合當時的習慣？其實“攬”字為右軍避家諱的看法，自古迄今，殆無異論。換言之，這說明人們實際上已經默認了這個事實：王家避諱至曾祖四世。從這個“既成事實”的意義上講，我們接下來應該去證明的就是“攬”之避諱方法是否符合當時習慣，實際上此事也就等同於證明《蘭亭序》之真偽，其意義不可謂不大，從而這個問題的討論便也成為本文討論的主旨所在。

從上面的討論可見，問題一和問題二雖各自前提不同，但在結論的某一方面卻有其殊途同歸的意義：即不管“攬”字是後人妄加還是原作本有，兩者都有可能成為《蘭亭序》為後人偽造說的證據。由於問題一不具有普遍性，可

留待於今後重新討論。

現在我們著重討論問題二：《蘭亭序》“攬”字避諱法是否符合當時習慣？以結論而言，筆者是持否定態度的。為了證明此事，我想首先對《蘭亭序》的“攬”字提出以下五點質疑：

1、古人避諱改字，本為禮數習俗之事，以其帶來諸多麻煩不便，是無人喜而為之。為之者，不得已也。比如遇到草擬誥詔公文，或書寫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時，在實在無法繞開諱字的情況下，才以改字代諱。然而《蘭亭序》是自撰之文，作者可以任意選詞擇字以造句作文，故理當不存在所謂“遇諱”改字問題。自撰文不同於撰寫公文或書寫專有名詞，王羲之何以寧願犯其先祖王覽之家諱而必用覽之改字“攬”以書蘭亭文？其必要性何在？

2、“覽”字既非誥詔公文必用之語，也非專有之人名地名，因而無必用而不可之理。與“覽”同義字多矣，如讀、觀、詠、誦、閱、見、看、省、睹等字，皆可不必要避諱而用之，王羲之何以皆棄之不用，而必拘泥用覽之改字“攬”？

3、若謂王羲之獨鍾“覽”字，覺得文中無此字就不足以增飾其文藻，舍之則絕難有合用者，那麼今遍檢傳世右軍文以及大約四百餘通法帖尺牘文（《法書要錄》所收褚遂良《王羲之書目》張彥遠《右軍書記》諸帖文及傳世諸法帖文），何以獨不見還有第二個“攬”字？

4、按：“攬”義，《說文》解作：“撮持也”；《廣雅》《釋詁》同解作：“持也”；《釋名·釋詁容》解作“斂”。義均釋作撮、持意、即如今之抓取、總攬意（或亦含拂拭義，詳下註），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含覽字的以目閱讀、以口詠誦之字意的。而《蘭亭序》文中用“攬”，遂使文義不通矣⁽⁷⁾，此盡人皆知而何以羲之獨不自知？且必於文中反反覆覆（二回）使用“攬”不可？

5、“覽”與“攬”在《廣韻》中均為“盧敢切”，屬同音字。用“攬”代雖能避“覽”之形而未能去其音，不合當時避諱習慣。如此一改，遂使《蘭亭序》成為一篇只能觀覽不能念誦的啞文了。

從以上諸疑中我們感覺到，《蘭亭序》中所用的“攬”字既有違悖邏輯的一面，也有不合情理違背史實的一面，對這些奇怪現象如何解釋？《蘭亭序》會不會真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樣，其多出《臨河敘》的一百六十七字文為後人附加之偽作？作偽者是否故意以“攬”竊入文中，以使世人相信為王羲之真筆？若真是如此，筆者認為其作偽的馬腳卻也恰好暴露於此。

其實利用諱字假托前人的例子在歷史上並不罕見，清人周廣業精研避

諱學，積三十年成《經史避名彙考》（下文略稱“彙考”）一書，博引旁徵，資料豐富，堪稱集斯學之大成。周廣業在論及古代典籍中出現應諱而不諱現象時，總結了四條原因，其中一條就是“假託前人”。⁽⁸⁾所謂“假託前人”，即指利用避諱來假託前人文字，乃後人造假之慣用技倆之。筆者認為，《蘭亭序》的“攬”字就涉此嫌疑，現詳證如下：

首先看看《蘭亭序》所用的覽之改字“攬”，是否合乎當時的避諱方法和習慣。為此有必要先說明一下避諱學，並結合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期的避諱實態，對改字“攬”從其義、音、形三方面來做探究。

三·關於避諱改字的方法

〈一〉避諱的由來及與本論的關聯問題

避諱源於古禮。據《左傳·桓公六年》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可知於周時已行此禮。現據《禮記》，將其中與避諱法有直接關係的條例列出，以利於問題的討論。⁽⁹⁾須要指出的是，這些條例只是後人據之以避諱的理論依據而已。至於後世遵守的情況，則因時因地因人而疏嚴同異。

1·卒哭乃諱（曲禮上）：意指人死後哭三天即開始避其名。即所謂“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檀弓下）此雖諱禮之基本，但到後世發展到有時亦須避生諱的程度。如漢代《史記》諱“徹”改“通”、《漢書》諱“莊”改“嚴”即是。晉明帝敬王導若長尊，見之但稱其字“茂弘”（《晉書》卷三十五王導傳）而諱言導名，甚至為了避導生諱還詔：奏事不名。所以在王羲之尺牘中很少見有直稱對方之名的，即使對其子女亦但稱字或小字。

2·舍故而諱新（檀弓下）：意為中止舊諱轉避新諱。舍故即已祧不諱。陳垣謂：“祧者，遠祖之廟……除太祖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內則諱之，七世以上則親盡。遷其祖於祧，而致新主於廟，其已祧者則不諱也。”（《史諱舉例》卷五“已祧不諱例”條。以下略稱“舉例”）按，此乃帝王諱禮，周廣業以為諸侯五廟，又謂古人五世親盡。（均見《彙考》卷三）據此知古人對五世祖以上的遠祖是可以“已祧不諱”的。筆者傾向於東晉琅琊王氏家族應遵循古禮，大約避諱不止於三世。（參見注（4））

3·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曲禮上）：意即不得以私諱妨礙公事。《通典》卷百四禮篇六十四“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晉”條引晉

人議論：“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為《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即此義之註腳。前舉晉王舒所以不得已而赴任會稽，即屈服於此義。

4·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上）：意指在教、學詩書時，誦讀可以不必在意避諱。然在魏晉諱禮嚴格的時代，此事也受到限制。參見下《魏晉士族犯家諱實例表》中諸例，可見一斑。

5·入門而問諱（曲禮上）：意指在與人交往時須時刻注意，不要輕易冒犯對方家諱。以六朝例之，詳參下《魏晉士族犯家諱實例表》，可見避諱一斑。

6·二名不偏諱（曲禮上）：意指名為二字者，不二字連稱即不算犯諱。又云：“二名不偏諱。夫子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以王羲之例之，則王獻之只要不連稱其父“羲之”二字即可。魏晉士族人名中不諱“之”之理由或即本此？⁽¹⁰⁾（詳參其中王右軍父子名何以不諱“之”一事之議論）“不偏諱”本只適用於“二名”，即雙名。以瑯琊王氏人名譜而論，就已知情況來看，王氏一族中王覽一系至王羲之父叔伯輩為止，皆為單名，故須避諱，不存在“不偏諱”問題。其下遂左右大致可分為二系：一系為王曠、虞、彬三支以及王舒一支，此系以下之子孫皆雙名，單名遂止於此世。如其代表者王曠子王羲之這一世以降，名中皆含“之”，父子祖孫皆可名同“之”字而不須避諱，至長者甚至可以延續五、六世；另一系則主要是以王導為主的在王氏中最為龐大繁茂的一支。此系以下仍延續單名，故父子祖孫依然避諱如舊，無“不偏諱”問題。至於二系之人名至王羲之這一代，含“之”與不含“之”二系，何以遽分彼此，且涇渭分明？其原由不得而知。關於王羲之父祖輩以上何以皆單名之原因，與東漢以來人習用單名有關。陳寅恪引“東漢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譏二名之義、習用單名。”（已出）之傳統說法來解釋此現象，似並不確切（關於此問題，詳清周廣業《彙考》卷一。茲不詳引），當以陳垣的王莽禁二名之解釋為是。陳垣說：“自王莽禁二字為名後，單名成俗者二三百。其時帝王既無二名，自無所謂偏諱。宋齊而後，二名漸眾。”（《舉例》卷五“二名偏諱例”條。關於王莽禁二名記載，亦可參見《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至於王莽之禁何以能延續二三百？宋人王楙的看法是：“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偽之政，一切掃除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見《野客叢書》卷二十二“後漢無二名”條。王文錦點校，中華書局“學術筆記叢刊”本，

1987年。)然而瑯琊王氏至王羲之這一代,子孫已有用“之”成雙名者,此或即“二名”解禁之先聲亦未可知。考魏晉人名出現“之”的時間,大抵與王羲之世代相同或稍晚,如太原王氏一族,從王述之子開始名中含“之”,其出現時期亦大致與瑯琊王氏近。據此,“二名”之復活則不必待“宋齊而後”才有,其於東晉時已見其端緒。

7·禮不諱嫌名(曲禮上):意指與諱字音同之字不須諱。在六朝其具體例子可以參考下文對《魏晉士族犯家諱實例表》諸例的歸納分析。

關於以上諸避諱條例的性質,根虞萬里先生總結:1是喪葬中的諱禮;2是告諱法;3是區別不同場合的不同避諱對象;4是允許不諱的場合;5是循行諱禮的措施;6、7是名諱的限制與諱法。(虞文《先秦諱禮析論》前出)這些古禮所記條規,成為後世避諱應遵循的幾項“基本原則”。陳垣說:“避諱至晉,漸臻嚴密。《通典》一〇四禮篇所載諱議,大半出於晉人。”(《舉例》卷八“晉諱例”條)。從《通典》所收晉人對諱禮的議論可知,當時這幾項“基本原則”確實就是他們遵守避諱禮的指南。以下結合“攬”問題,看看當時人具體是怎樣避諱的,先從避諱法說起。

〈二〉秦漢魏晉南北朝的避諱改字之基本方法——同訓代換、同義互訓

陳垣謂:“避諱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舉例》卷六“已避諱而以為未避諱例”條)⁽¹¹⁾另外再加一種不太常用的“改音”方法。一般來說,在隋唐以前避諱方法比較單一,多以改字、空字之法為用,缺筆與改音(陳垣認為此法始於唐)之法則稍晚出,至唐代以後才開始普遍使用。因《蘭亭序》所用“攬”字乃改字之法,與空字、缺筆法無關,不煩詳述。今專就改字法議論。

以下以清人周廣業《彙考》和陳垣《舉例》,再參考諸史文獻記載以及前人近人並今人涉及諱事的有關論述,對當時改字法避諱問題重新檢討,以期究明《蘭亭序》之改字“攬”的疑問,並見當時人避諱實況之一斑。

為了明瞭起見,先按時代順序、當避諱者人名及當時人的避諱方法,編成《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國諱例表》(簡稱《國諱表》)如下,供參考。按,國諱之避諱方法,一般來說是可以代表當時人的基本避諱方法的,其與私諱家諱的避諱法應該不會相去太遠。當然也不排除私諱家諱出現的一些特殊情況,關於這點,本文在後面將詳述之。

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國諱例表

時 代	諱 名	避 諱 方 法
秦		
秦襄公	子楚	呼楚國為荊
秦始皇	正、政	改正月為端月
楚		
項羽	籍	改籍氏為席氏
漢		
高祖	邦	改邦為國
高祖後	雉	呼雉為野雞
惠帝	盈	改盈為滿
文帝	恆	改恆山郡為常山郡
景帝	啟	微子啟呼作微
武帝	徹	改徹為通
昭帝	弗	改弗為不
宣帝	詢	改詢為謀
哀帝	欣	改欣為喜
光武帝	秀	改秀為茂
明帝	莊	改莊為嚴
和帝	肇	改肇為始
殤帝	隆	改隆為盛
順帝	保	改保為守
桓帝	志	改志為意
靈帝	宏	改宏為大
獻帝	協	改協為合
三國		
魏		
齊王	芳	芳林園改作華林園
吳		
景帝	休	休陽縣改作海陽縣
太子	和	禾興縣改嘉興縣
晉		
宣帝	懿	改懿為茂或益、懿德改作茂德
景帝	師	太師改作太宰、京師改作京都
文帝	昭	王昭君改作王明君、昭武縣改作臨澤縣、蔡昭姬改作蔡文姬(沿用至今)
武帝	炎	炎改作盛、劉炎更名劉鄴
愍帝	業	建鄴改作建康、鄴縣改作臨漳 ⁽¹²⁾

元帝	睿	《宋書》王叡以元德字稱
成帝	衍	王衍呼作王夷甫、《世說新語》猶沿此稱
康帝	岳	改岳為獄、岱
簡文帝	昱	育陽縣改作云陽縣
宋		
順帝	準	平準令改作染署令
南齊		
高帝	道成	蕭道先之名改稱景先
梁		
武帝父	順之	改順為從
北魏		
獻文帝	弘	改弘為恆
北齊		
神武帝	歡	改歡為欣

從《國諱表》實例可以看出，秦漢魏晉南北朝避諱法主要為改字，且其所改必與原諱字在字義上保持一致或相近，即“同義互訓”。陳垣謂：“秦初不諱，其法尚疏。漢因之，始有同訓相代之字。”（《舉例》卷八“非避諱而以為避諱例”條）又引沈兼士之說：“考兩漢諸帝避諱所改之字，皆為同義互訓，而無一音近相轉者。”（同書卷六“非避諱而以為避諱例”條）通過實例也不難看出，早期的避諱方法一般來說的確比較單一，基本上是“同訓相代”、“同義互訓”之法，雖至於晉，亦未大變，如陳、沈兩氏所論。現再舉一例，以見晉人當時是如何議論改諱字方法的。表中晉康帝諱“岳”，關於當時晉人議論改“岳”諱字的文獻記錄，今猶能從《通典》卷一百四禮篇六十四“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條中得知。⁽¹³⁾由晉朝掌禮大臣的議論可知，當時的改字法則必須是：代用字與原諱字在字義上須互通，即所謂“辭訓宜詳”“取義為訓”之法，《顏氏家訓》卷二風操篇六所謂：“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之”之法可以印證也。清人趙翼在論及古人（指隋唐以前）臨文避諱之法時，舉古人諱名之法有三（一以“同”字代諱字，二是人名以其字行。因與本論無關，姑略之不論。）其三則是：“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以代之”（《陔餘叢考》卷三十一。前出）。陳垣總結此法的規則是：“各諱皆有一同義互訓之字相代”（《舉例》卷一“避諱改字例”條）。此外在改字法中，還有一些極端的避諱例子，即所謂嫌名避諱。三國孫權立太子和時，禾興改嘉興；東晉司馬昱時，改育陽為云陽。

但這種避諱一般不太普遍，因為同音字過多，實行起來將諱不勝諱。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初步認定，從字義上論，改字必須與諱字同義，欲改諱字則必得其同義同訓之字以代之，是為改字法之一般原則。今從《國諱表》上所舉實例來看，亦大抵不能出此範圍。

以是觀之，《蘭亭序》改字“攬”在字義上與“覽”不通，難合當時“皆須得其同訓以代之”之改字法規則。當時的國諱的避諱方法，除了上述必須同訓代換、同義互訓外，有時還更加嚴格，甚至不得用字中含同形同音之字以代諱字。國諱之法如此，門閥士族家諱，當亦去此不遠。

〈三〉六朝避諱實態——諱字的改字不得既同其形又同其音

現在再來考察改字的字音、字形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應從當時人是否遵守家諱的實例入手，這樣才能使問題變得具體化，更加明瞭易解。

關於六朝士族家諱之嚴，前人已多所論之矣。如“今人避諱，更急於古”（《顏氏家訓》風操篇六）、“六朝時最重犯諱”（清趙翼語。前出）、“避諱至晉，漸臻嚴密”（陳垣語，見《舉例》卷八“晉諱例”條）、“六朝士族最重家諱”（陳寅恪語。前出）。至於究竟有多嚴格，還是通過當時士族犯諱的記載來尋找其避諱的具體規矩。

以下錄出一部分魏晉士族之間的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犯諱”實例，編成《魏晉士族犯家諱實例表》（簡稱《家諱表》），以略見當時家諱森嚴之一斑。

魏晉士族犯家諱實例表

(1) 《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 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
(2) 同書卷六十八賀循傳（父邵）： 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鍛鐵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3) 同書卷十帝紀第十（孔安國父名愉）：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懼，亦明前諱。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祿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鈞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發錢，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啟，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4) 同書卷八十四殷仲堪傳： 仲堪父，素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鬥。孝武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曰：「患者為誰？」仲堪流涕曰：「臣進退惟谷。」
(5) 同書卷七十五王述傳。代殷浩為揚州刺史： 初至，主簿請諱。述曰：「亡祖先君，名播天下，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6) 《世說新語》方正篇十八：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機）：「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陸士龍（雲）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7) 同書任誕篇五十： 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玄）。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謂左右：「令溫酒來。」桓涕乃流鳴咽。王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桓溫），何幹卿事？」
(8) 同書文學篇七十七：（庾亮）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俊」，以「亮」為「潤」云。
(9) 同書排調篇二十五記庾翼子：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註引《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10) 《南史》卷十九謝超宗傳（父名「鳳」）： 宋文帝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謝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旦侍至尊宴，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其覓毛，待至暗不得，乃去。
(11) 同書卷二十二王慈（父名「僧虔」）傳： 謝鳳子（謝）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王）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僧虔？」慈曰：「慈書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
(12) 同書同卷同傳： 慈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同詣佛寺，正遇沙門憺，約戲慈曰：「今日諸僧，可謂虔虔。」慈曰：「卿今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室？」
(13) 同書卷二十三王亮傳（父名「攸」）： （亮）遷晉陵太守，時晉陵令沈質之性狂疏，好犯亮諱，亮不能堪，因？代之。質快，快造座曰：「下官以親諱被代，未知明府諱，是有心愆，無心攸，乞告知。」亮不履下床而走。
(14) 同書卷二十三王亮傳（父名「攸」）： （亮）年五六歲時，讀《論語》至「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之曰：「何不改為「耶耶乎文哉」？」珣應聲曰：「尊者之名，又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應作「翼」）」。「原作「草上之風必偃」。
(15) 同書卷六十殷鈞傳（父名「叡」）： 自宋齊已來，公主多驕淫無行。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輒滿壁書殷字，鈞輒流涕而出。主又命婢束而返之，鈞不勝甚忿。
(16) 《魏書》卷一五司馬朗傳：

	(朗)方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也。”客亟謝之。
(17)	同書卷二十三常林傳: (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對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18)	《顏氏家訓》卷二風操篇六: 臧逢世,臧嚴之子也。(中略)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幾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
(19)	同書同卷: 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白綰”。
(20)	同書同卷: 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
(21)	同書同卷: 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
(22)	《太平御覽》三六二引何法盛《晉中興書》: 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導欲出王舒為外援,及更拜為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三千石。舒上疏以父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鄒〔原註:古會切〕。舒不得已就職。
(23)	《北齊書》卷二十四杜(北齊高祖父諱樹聲): 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策,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
(24)	《南齊書》卷四十一張融傳(父名暢): 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25)	《梁書》卷十六張稷傳(父名永): (稷)復為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
(26)	同書同卷二十九蔡樽傳: 帝嘗設大臣餅,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箸執筯曰:“爾。”帝曰:“卿向何變,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
(27)	《周書》卷四十八宗如周傳: 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如周。早知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

近人陳登原曾舉例論述了三國以降至於魏晉間的士族避家諱情況,並做如下總結:

- 一, 三國之時, 已嚴家諱, 非特己所弗言, 並亦禁人勿言。
- 二, 六朝之時, 自家之諱, 已至禁人勿言。同音之字, 甚至亦付之

諱。

三，聞諱而哭，蓋以嚴家諱為孝子標準之一。

四，家諱之避，地方官居然已懸諸令甲。⁽¹⁴⁾

根據上據實例以及陳氏的總結，我們進一步將當時士族之間在“犯諱”時出現的避諱特徵歸納如下：

一是彼此談話時必須時刻注意，不能直接說出含對方家諱之字，其直犯之例有(2)(6)(7)(9)(10)(11)(12)(13)(14)(15)(16)(20)(21)(23)(26)(27)。有時嚴格的時候，甚至連同音之其他字，也須盡量回避，即所謂“嫌名”者是也。如(1)(8)(14)(23)(25)即其例。陳垣認為：“嫌名之諱，起於漢以後”(《舉例》卷五“避嫌名例”條)。按，《禮儀·曲禮》曰：“禮不諱嫌名”，即在古禮中，本來對於避“嫌名”一般是並不要求人們必須遵守的。因為漢字中存在大量同音字，這樣做將諱不勝諱。顏之推曾舉“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為例，認為如果連這種嫌名之諱也須一一遵守的話，將會“下筆即妨，是書皆觸”或“交疏造次，一座百犯”的(《顏氏家訓》卷二風操篇六)。然而此諱之行，因時因人而寬嚴行止，並不普遍，如《國諱表》亦僅見因“和”改“禾”、因“昱”改“育”兩例，《家諱表》也只有(14)(22)例。儘管如此，通過僅有的幾例，亦可想見六朝時從皇氏到士族，避諱情形確實極其森嚴。這些士族犯諱之事例，記錄了當時不能說、不能聽的避諱例，實際上也就等於告訴我們：這些同樣也是當時在紙上不能見、不能寫的避諱規矩，如(5)(15)(18)(25)。關於任職地名犯家諱而要求移官易職，改授易名，也是晉代一大特色。如(3)(22)(25)即是。此外，《家諱表》中與王羲之直接有關的例子有其上司王述(5)、伯父王舒王(22)以及王氏後裔王慈(10)(11)等。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由避生諱而發展起來的不能直呼對方名字的禮節，如(8)(11)(12)(26)(27)。晉人尺牘對平下輩多稱對方為“足下”，親近者稱其字或小名，雖父與子書，亦鮮見直呼其名者，這大約與此習慣有關。通過這些例子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魏晉實乃禮拘愈嚴而犯之者愈甚之時代也。

再據《國諱表》及《家諱表》之例，考察《蘭亭序》改字“攬”在音、形上是否與之抵牾。

首先“攬”與“覽”字是同音同形。姑且不說改字在原有諱字上加偏旁部

首、保留原有字形的避諱方法在隋唐以前極為少見，即或有之，亦必須互訓且不得同音，此可據《國諱表》《家諱表》上的諸實例以證。而“覽”“攬”卻是同聲同韻的同音字。問題是即使加了手字旁，那也只是解決了形而無法解決音的避諱。

在魏晉六朝，改字雖有帶偏旁之例，但如遇其字中仍存原諱字的聲、形之部（除了常用的偏旁部首以外，如“覽”中之“見”），亦盡避而不用。如《國諱表》中之晉元帝諱“睿”，《宋書》王叡以避“睿”諱而改以字行；晉愍帝諱“業”，“建鄴”以避“業”諱而改作“建康”，“鄴縣”改作“臨漳”，（見注（12））是以知“叡”、“鄴”二字雖非直犯諱字“睿”、“業”，然亦被改去不用。又如（20）之“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煙”之例，理亦同此。以此知在一般情況下，改字雖外加偏旁部首，但只要字中仍保存與諱字同形同音之部者，不得為改字。故“叡”不能代“睿”，“鄴”不得代“業”，“紜”不得代“雲”即其例證。甚至還有字中保留與諱字同形而異音之部者，亦難以通行。如（22）的“會”與“鄘”（古會切）本屬異音字，但因形同而遭王舒拒絕。然而《蘭亭序》的“攬”卻可以代“覽”，確是匪夷所思。

總之，《蘭亭序》中的以“攬”代“覽”之現象，以義言之：二字未能互訓；以音言之：二者則為同音之字；以形言之：“攬”雖加手提旁而未能去“覽”之形。是以“攬”代“覽”，顯然不合當時避諱習慣。

現在我們退一步說，假如王羲之於蘭亭盛會當日果然即興寫了“攬”字，則面對了四十餘位與會名士，不知他是如何把《蘭亭序》吟誦給大家聽的？不知吟誦時他是否會“正色”、“流涕鳴咽”、“狼狽而退”、“不履而走”、“聞諱必哭”、“對之流涕”？亦不知在場的那四十二位“攬者”（中還包括王羲之的三個兒子凝之、徽之、獻之在場），又當如何“有感於斯文”？^{（15）}更重要的是，王羲之不惜招來如此重重困惑不便，亦必使用“攬”字理由究竟何在？若別無理由，此現象的出現實在是有悖常理的。因此，我們不能不說，《蘭亭序》里的以加手字旁的“攬”去代“覽”的現象，顯然是頗成問題的。

四·諱字改字中幾個特殊例子的說明

〈一〉關於古籍中的字形與避諱字

以上結合“攬”字對當時的一般避諱現象與習慣、方法等做了簡單的考

察。但是有一點須要特別強調的是，考察字形變化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使得我們不得不只能以用例之多少而忌用用例之有無來作證據，論證現象，總結規律。特別是在傳世文獻裡出現的諱字現象十分復雜，幾乎可以說甚麼情況都可能出現。所以這種例子出現的多與少、常見與罕見則往往成為我們斷定的基準。周廣業《彙考》旁證博引，資料浩瀚，但他所論證歸納的幾乎每一個規律，都可以從《彙考》中找出反證資料。周對此原因所作的總結如前所舉四條，而最基根本的原因就是古籍中的“刊落不盡”和“校寫訛易”，亦即陳垣所謂“古書輾轉傳寫雕板”（《舉例》卷六“已避諱而以為未避例”條）原因所致。其實周氏撰寫《彙考》是以古籍作為考察諱字的對象的，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會受到“古書輾轉傳寫雕板”致訛以及後人“改回”諱字等因素影響。正因為如此，周在解釋其論證方法時也只好采用以例證的多與寡、常見與罕見作為論證與斷定的依據。⁽¹⁶⁾比如我們在古籍中考察“覽”與“攬”字義是否互通時，在資料中一定會出現正反兩方面的例證。而對之仔細求證則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關於“覽”“攬”在古籍文獻中出現的所謂字義“互通”情況，可以參見筆者對此的看法⁽⁷⁾。總而言之，由於這種用“攬”字代“覽”以避諱的類似方法，其結果勢必會導致因文義不通帶來的閱讀上的混亂。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在唐代以前，即在尚未實行缺筆避諱法的漢魏兩晉時期，人們對避諱改字是極其講究字義必須“互訓”的，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混亂。清人趙翼論曰：“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礙。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為簡易可遵矣。”（《陔餘叢考》卷三十一）若移此論以喻“攬”“覽”，亦不得不說其“窒礙”矣。

由是可知，凡事除具有其普遍性外，還應該有其特殊性。在一般情況下，於原有諱字上增加偏旁部首並保留原來字形之避諱方法，雖然於魏晉時期極為少見，但也不可謂皆無。如“政”與“正”“鄧”與“會”以及改音字“邵”與“昭”的避諱，即屬於此特殊之例。為了避免因此之存在而對本論產生疑義，故不得不在此將這些特殊事例加以解釋與澄清。

〈二〉關於“政”字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王羲之不能“攬”字代“覽”，那麼他為何可以用“政”代“正”呢？兩者之間難道有何區別？我們認為，“政”與“攬”還是有一定區別的，二者不可等同而論。

關於王羲之為諱祖父王正諱而改“正”為“政”的說法似起於帖學研究頗為發達的宋代。南宋陸游(1125-1209)《老學庵續筆記》謂：“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一月’，或為‘初月’，其他‘正’以‘政’字率以‘正’代。”張昞《雲谷雜記》卷二云：“王羲之祖尚書郎諱正，故羲之每書正月，或作‘一月’，或作‘初月’；他‘正’字皆以‘政’字代之，如‘與足下意政同’之類即是。後人不曉，反引此為據，遂以‘正’、‘政’為通用，非也。”周密(1232-1308)《齊東野語》卷四“避諱”條謂：“王羲之父諱正(祖父名之誤，其父名曠)，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代之。”⁽¹⁷⁾按，宋人皆以為王羲之書正月為初月或一月，確是事實(後文詳說)，但又說王以“政”代“正”來避諱，則似乎未必盡然。王羲之書中確有“正”書作“政”的情況，如《十七帖》之《七十帖》之“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等即是，此外其他一些法帖亦有類似寫法，茲不詳舉。其實這裡就引出來了一個問題，即為何“正”字有時可以用“一”“初”來代，而有時又用“政”來代？

在此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按照諱字改字必須“同義互訓”的原則，“一”與“初”無疑是“正”的改字，那麼“政”究竟是不是改字？我認為王羲之在“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等處所用的“政”字其實並非改字，不是為避“正”諱而加上了反文旁，與“覽”旁加手邊成“攬”完全不同，王羲之在此只是選擇了另外一個與“正”無關的字使用而已。此亦猶今人書寫“做”為“作”一樣，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在避諱，或者說應該看成是有避諱的意圖而並未行使避諱之手段(如使用改字)。現就其字之音、形、義與避諱之關係詳證如下：

必須承認，要弄清古代的“政”與“正”的避諱情況是十分不易的。因為秦始皇諱政(一說為正)，當時因避此諱，情況就變得極其複雜，給後世在考察辨別上帶來一定的困惑。因此，先秦時期這二字的關係究竟怎樣，引起了學者的爭論。(在此我們只能就其相關部分加以討論。關於此二字的歷史淵源以及使用例以及諸家觀點說法等，就不作更大的擴展論述了)周廣業在《彙考》卷五就此秦諱正、政字，旁徵博引，收集了大量先秦文獻中有關此諱的使用例證。然而也正是因為引用資料豐富全面，遂出現相互矛盾抵牾之處，尚無法給出一個比較清晰的變化脈絡的可信說法。正如周本人所謂“正政征三字古多通借，雜出秦諱，甚難區別。”(同上)但是從周書搜集來的大量資料來看，可以斷言的是先秦“正”與“政”確實彼此互通，所以秦時避諱禁及此二字。陳垣論曰：“或謂秦始皇名政，兼避正字。故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稱正月為

端月，此避嫌名之始也。不知政與正本通。始皇以正月生，故名政。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避正非避嫌名也。”（《舉例》卷五“避嫌名例”條）又說“正之有征音，非為秦諱”（同書卷六“非避諱而以為避諱例”條），否定了其為嫌名或改音諱字的可能性。

前人論諱，只注意諱字的改字方法，即形音義的互換與改變，從來沒有注意過諱字在使用法上的區別。所以在整理歸納避諱規律時，往往為資料中出現的相互齟齬矛盾的現象而感到困惑不解。如上舉宋人，雖然他們注意到了王羲之避“正”諱現象，但卻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們說王羲之以“一月”和“初月”代替“正月”，這不錯，那麼為何不見王羲之以“政月”代之呢？如果說王羲之“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句中的“政”是為避“正”諱的話。這個問題就涉及到避諱字的用法上來了。其實從周書裡搜集來的大量例證資料來看，秦時雖禁“政”“正”，但多限於名詞，對於作為動詞用（類似讀如征聲或用如征義者頗多）的則寬松得多，甚至可以不避諱。按，正、政所以能夠從名詞轉化並多可不須諱者，若不是秦時避諱改作征音之故（周以為秦前正有征音。陳垣亦以為“正有征音、非為避秦諱”），就應是與其亦通征音義作動詞用有關。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如周廣業所舉“酈元道《水經註》載李斯書《銅人銘》云‘正法律，同度量。’在始皇二十六年，卻未避正字。”即其一例，具體例子可參照周書，茲不一一列舉。到了王羲之時代，可以說“政”“正”在用法上的區別已經十分明確，不再含混不清了。今就這一方面的問題做進一步考察。

先說字義。如《七十帖》裡的“政”字是作為副詞來用的。按，古之“正”“政”，亦猶今之“作”“做”，二字本有可互通與不可互通之別。在用如副詞和動詞時，“正”“政”之義本可以互通，故不存在以此代彼以避其諱的問題。

◎“正”“政”可互通例：

作為動詞之義以用者，如習見的“斧正”“郢正”“教正”“校正”，亦可作“斧政”“郢政”“教政”“校政”，即其例；再看作為副詞之義以用者，如：《墨子·節葬篇》：“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世說新語·規箴篇》二十二：“殷凱病困，看人政見半面。”北周庾信（513—581）的《賀平鄴都表》⁽¹⁸⁾：“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等等，皆通“正”而用，其義亦如今之正好、恰好，均與王羲之《七十帖》之用例相同。若上舉諸例非避諱，則王羲之《七十帖》所擇用之

“政”，自非屬避諱。

以上作為動詞、副詞的“正”“政”之互通互用，就如同今之“作”“做”，非避諱。

◎“正”“政”不可互通例：

作為名詞意義上的“政”“正”，二者基本上涇渭分明，不互相假用。如政務、政令、政書、攝政、當政等之“政”字，一般不與“正”通用；反之，如正史、正音、正宮、正房或端正等“正”字，一般亦不與“政”通用。⁽¹⁹⁾所以，如果王羲之在使用名詞意義上的“政”“正”時，書“正”而以“政”代，則屬避諱無疑。然而我們知道，王羲之凡擇名詞意義上的“正”以為用時，正如宋人所指出的那樣，未嘗為了避諱而以“政”代之，如在其《初月帖》等法帖中，凡遇“正月”，均作“初月”或“一月”而不作“政月”者，即其明證。再舉一例：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記陸逞：

父政。……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為太守；博陵有王沈之封，其兒不為刺史。⁽²⁰⁾

“御正”為北周官名，陸逞不拜，以“正”觸犯其父諱“政”也。其意與王羲之以“初月”代“一月”同，用如名詞，則須諱耳。

為何用如名詞則須避諱？因為古人避諱之禮，本來的目的就是為避先人之名諱而設，因此避諱學又稱之為避名學。所以名詞之用，自然要求比副詞動詞等嚴格得多，這就使得“正”與“政”在使用時出現了避諱學上的複雜情況。

再說字形字音。在上面已經闡明了的字義及用法的前提下，現在再來討論諱字的字形字音。如前文已經論及，古代諱字的代用字不得含同形同音字。但偏旁部首的形音並不在此之限。因為偏旁部首是構成成千上萬漢字的最基本單位，它作為本字的使用意義遠不如作為組構新字的“配件”意義大。因此部首實際上也跟文字筆畫的點、橫、撇、捺一樣，只要是作為“配件”組字而非本字使用的話，都可以存其形音而不諱，就如存點、橫、撇、捺於一字之中然，正不必在意其在字中之某一局部同形同音，這也好比“覽”字中含部首“見”一樣，未聞右軍因“覽”而諱“見”。

“正”字的情況實際上就頗近“見”字，與“言”“手”“木”“石”“金”“日”

“月”等字一樣，皆屬部首字形，故王羲之書“政”，自無嫌其中含“正”形音之虞。又，“政”字通動詞征伐之“征”，⁽²¹⁾然王羲之卻並不避“征”字，⁽²²⁾這說明了含部首“正”的字的確不須避諱。其實這個道理亦同於上舉之“作”“做”：其字音雖相同，其字義雖可互通，其字形亦同屬人旁，然而二者畢竟不是一字，所以盡管同音也自然無妨。當然，在討論這一字避諱時，還須考慮其他因素的存在，特別是在用法上。“征”為動詞，不存在這個問題。至於其他字中含“正”形又為名詞的字，就可能要避而不用。如右軍正月作初月，陸逞因“政”不赴御正之任，即其例。

順便提一下，郭沫若曾說過：“（王羲之）他帖正字作‘政’，為避其祖王正之諱正同。……其實後人愛寫‘雅政’、‘斧政’、‘郢政’等，都還替東晉王家避諱呢。”周紹良論王羲之避“正”諱改“政”時也說：“王羲之一些書札中凡端正之‘正’俱改用政事之‘政’以避其祖父王正諱”云云（均參見注（3））蓋皆因未明政、正二字的避諱歷史及使用法上的區別，故有是說，不足為訓。特別是周謂王羲之“端正”之正字亦避諱作政，此說尤誤。按，檢王羲之尺牘，未見類似“端正”等名詞意義的“正”字被寫作“政”之例。

〈三〉關於“鄮”字

現在再來詳細討論本文開頭介紹的“會”“鄮”改字例。前文所列舉的“犯諱實例”（20）節錄了《太平御覽》三六二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所載王舒避諱例子。此事《晉書》卷七十六王舒傳也有如下記載：

時將征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廷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鄮，舒不得已而行。

從以上記載的以“鄮”代諱字“會”的情況，但我們應該看到以下幾點特殊情況：第一，王舒既非帝王，所拘之諱乃家諱而非國諱，故不能改地名以就其私。第二，據“朝廷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的議論，知“會稽”之“會”與普通之“會”字在當時即已非同音字（與“鄮”同為“古會切”。《太平御覽》三六二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此文“鄮”註“古會切”，至今亦然。）第三，朝廷雖然改“會稽”為“鄮稽”以遷就王舒，但是王舒並沒有完全滿意，只是迫於朝廷之命不

可抗拒，故才“不得已而行”。從上三點可知，在諱字上加偏旁部首而能作為其代用字，並非當時可以通用的避諱方式，而是在特殊情況下的權且折衷的變通方式，其與《蘭亭序》裡“覽”之改字“攬”的情況大相逕庭：非但在地名、異音以及行政命令方面其性質不同，最根本的相異之處，乃是此改字並非出於王舒本人之自發意志。而《蘭亭序》若真為王羲之自撰，改字“攬”則只能出於王羲之本人之自發意志。因為《蘭亭序》為其自撰，又非詔誥公文，想不至於有皇帝或朝廷強迫他非書“覽”字不可之事。按，王舒即王導（267 - 330）等人的從弟，屬於王羲之父輩。是王舒所拘避諱之禮，當即瑯琊王氏一族皆須遵守的家諱禮法無疑，故身為同族子弟的王羲之，自無可以例外的理由。此外“字同音異”或“音異字同”的字皆不可代諱字之事，亦由上引文獻可以得證。看來在當時，諱字之代用字不得同形同音確為事實。

無獨有偶，王舒次子王允之（303 - 342）亦經歷過與其父親同樣的遭遇。唐杜佑《通典》禮篇六十四“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晉”條引晉人記錄如下：

東晉咸康八年（342），詔以王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為“《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

此事亦與王舒同樣，實為帝王朝廷之命不可抗逆，即王允之礙於所謂“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大義名分不得已而為之，絕非發自本人意願。

由以上文獻記載可知，“鄧”字乃變通之法，決非當時避諱慣例。《蘭亭序》為私人自撰文，既非“國之典憲”，又無王舒父子“不得已”而為之的不情願，這就是以“鄧”不得反證“攬”能成立的根本理由所在。

〈四〉關於“邵”字

陳垣《舉例》卷八“晉諱例”條列文帝司馬昭避諱例：“昭陽”改“邵陽”“昭武縣”改“邵武”。按，晉代正式的詔誥祭文等“昭”皆改作“明”，因而知

“明”乃當時官方正式所定之改字（參見清周廣業《彙考》卷十。周氏列改字“明”入晉諱“令式”類，列“邵”入“地理”類，並有詳考，可以參考），較“邵”改字為正式。故《舉例》卷八“晉諱例”條列列“邵”而不列“明”，似失之偏頗。

或許會有人問：如上所述，既然當時的改字原則須是“同義互訓”，則“昭”之改字“邵”兩者義非同訓，如何可以代諱字？今簡論如下：

在避諱方法中確實有一種不須字義“互訓”的改字方法，那就是避諱改音。即將應諱之字讀如另外一字的發音，寫作“音某”（出於語言使用習慣的考慮，所改之音大都不會與原諱字音相差太遠，所以多為音近之字）。實際上這是為念讀時方便避諱所設之法，非為書寫而設。為書寫所設者一般多為“同義互訓”的改字，比如《國諱表》中所舉大抵如是。這樣一來，往往就會出現以下這種情況：原來只是為了借其音讀的“音某”改音字，漸漸也被人們在書寫中使用起來，因而又造成了某一諱字也許會有復數的改字現象出現。如“昭”在書寫上規定的改字為“明”，然而在其他文獻中又出現了“邵”“韶”等改字，而後世卻不知“邵”“韶”原來實乃改音字。當然這種現象並不見，實際上實行使用不太普遍。陳垣則認為避諱改音“不過徒有其說而已”（《舉例》卷一“避諱改音例”條）。

“邵”與“昭”二字均為從召而形音截然不同的兩個字。下面就來證實彼此異音的問題。從理論上講，“邵”字所以能充“昭”之改字（實際上是改音字），當因其彼此異音，故才須借其音。以下通過與“邵”同音的“韶”與“紹”字來證明。

先看“韶”字。若它也能充“昭”之改音字的話，就說明定與之音異，也就可以證明“邵”音亦與“昭”不同。關於“韶”是否為“昭”之改音字，歷來意見不一。陳垣主張昭有韶音，非為晉諱⁽²³⁾，此說非是。據清周廣業以及虞萬里先生的考證，均認為“韶”乃“昭”之改音字⁽²⁴⁾。周書博引傍徵，證據充分。惜陳氏未能見周書。⁽²⁵⁾虞文則又在周之基礎上更進一步，闡釋發明，證成“韶”確為“昭”字改音字之事實。以周、虞之說為是。

其次，再看“紹”字。晉明帝名“紹”而不嫌“昭”諱，可證其音異，故得不犯諱。按，推明帝其當為司馬昭玄孫輩，世隔才五代，“昭”諱尚未祧也。陳垣《舉例》卷五“已祧不諱例”條論曰：“祧者，遠祖之廟，遷主之所藏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除太祖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內則諱之，七世以上則親盡，遷其主於祧，而致新主於廟，其已祧者則不諱也。”而至明帝

尚未滿七世（實際上皇家國諱往往終其朝代而諱之，並不止於七世）此亦可間接證明“邵”與“昭”本無相犯，故“邵”可以如同“韶”一樣，是“昭”的改音字。

最後再看看同音異字。有時在比較嚴格的情況下，往往會有一些走極端的例子，其嚴格程度近似避嫌名。如“照”字，本來與“昭”在字義、形上並不一致，屬於同音異字，唯音相同而已，但也不能作為改字來使用。《顏氏家訓》卷二記述梁時劉氏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惟依爾雅火旁作召耳”即其例。可見在六朝時，同音而字形微異如“照”字，亦須盡避。難怪顏之推嘆曰“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

然而“昭”與“邵”雖彼此為音形義皆異之字，但兩者畢竟皆從召（刀聲），其音相近。所以，在避諱極端嚴格的情況下，比如要求亦須避嫌名時，此類“音聲相近”（《禮記·曲禮上》“禮不諱嫌名”鄭註。）的字亦可能被要求避諱，這也能反證為何當時官方正式所定之改字是“明”而不是“邵”的理由所在。

五·結語

既然改字“攬”不能成立，那麼它為何會出現呢？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再思考這個問題。重複前文已設之問：即王羲之何以寧願犯其先祖王覽之家諱而必用覽之改字“攬”以書蘭亭文？其必要性何在？與“覽”同義字尚多，王羲之何以皆棄之不用，而必拘泥用覽之改字“攬”？對於這個問題，則又將引帶出另一疑問，即有關《蘭亭序》中語句的抄襲現象的問題（關於此事，筆者另有專論）。從結論上講，筆者認為《蘭亭序》最後兩句“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乃套用石崇《金谷詩序》最後之“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世說新語》企羨篇三記“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雖然王羲之對石崇金谷園集會很“企羨”，從某種意義上講，蘭亭之集確實有踵金谷之會的意思。⁽²⁶⁾然而在此暫且不去考察王羲之到底有無可能公然襲做石季倫文句，我們假定王羲之的《蘭亭序》就是對《金谷詩序》模倣之作，那奇怪的是，模倣的為何不是全文或全文的大部分，而只是挑出《金谷詩序》的最後那一句來模倣呢？而且還偏偏又是帶有家諱的那一句。

由以上的考察結果可知，在今本《蘭亭序》多出《臨河敘》的一百六十七字之文中，不僅存在著清人李文田、近人郭沫若等人指出的各種問題，更存

在著所謂諱字之改字“攬”字這一更為令人疑惑難解的問題,所以我們說,很難想像《蘭亭序》是王羲之自己創作的文章,後人參雜造偽的可能性極大。總之我的看法是,《蘭亭序》這篇文章的確疑問點太多,如果這些疑問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和排除的話,就不能認為是王羲之自撰之文。

《注 釋》

- (1) 日文論文《蘭亭序攬字考》發表在日本《書論》雜誌第三十一號(杉村邦彥主編,書論研究會發行。1999年)。後收在拙著《王羲之論考》第二章(東方出版,2001年。日文)中。中文稿《關於〈蘭亭序〉真偽的兩個新疑問》在日文稿的基礎上增補修訂,收在《蘭亭論集》(華人德、白謙慎主編,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
- (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3) 按,現今研究蘭亭學者,在真偽問題上儘管彼此觀點對立,但在認同“攬”乃“覽”之避諱改字這一問題上,均無異詞。如郭沫若、周傳儒、周紹良諸先生皆持此觀點。

郭曾用“于碩”筆名在《東吳已有“暮”字》一文說:“至於二覽字作‘攬’乃避其曾祖王覽之諱……。有人根據覽字避諱來證明《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作品,那卻是太天真的看法。”(《文物》第11期,1965年。後收入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蘭亭論辯》。周傳儒先生在《論〈蘭亭序〉的真實性兼及書法發展方向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一文中說:“……這‘攬’字是有問題的。觀覽之‘覽’,與延攬之‘攬’,意義迥別,不可混淆。除王羲之諱祖諱曾祖外,他人不會一諱再諱。何況當年在場的四十二名大知識分子,豈能瞠著眼睛看王羲之寫別字而不作聲?……根據這個世系(按,指周據《晉書》王姓各傳以及《王氏譜》列出的王氏簡略家譜)我們可以完全肯定,只有王羲之這房才能有這樣的忌諱。這是顛撲不破的鐵證、本證,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只有右軍本人,才能以‘政’代‘正’、以‘攬’代‘攬’。除了羲之本人記得清楚以外,他人不會去代查家譜。甚至智永,即使不出家,而在子、孫、曾、玄、來之外,也記不清了,何況王姓大族,誰能忌諱那麼多?智永為羲之七代孫、王正九代孫、王覽十代孫,這就證明智永不是改竄人。”(按,周說前半部分,即論證攬為諱字,覽與攬字義不同,不可混淆等,都是正確的看法。惟其在後半部分之論證存在著明顯錯誤。如他說:“只有王羲之這房才能有這樣的忌諱”這句話就不正確。按,王覽以下除王正一系子孫外,尚有王裁、基、會、彥、琛幾支,都須“忌諱”,非獨王羲之“這房”;又如他說:“只有右軍本人,才能以‘政’代‘正’、以‘攬’代

‘攬’。除了羲之本人記得清楚以外，他人不會去代查家譜。甚至智永，即使不出家，而在子、孫、曾、玄、來之外，也記不清了，何況王姓大族，誰能忌諱那麼多？智永為羲之七代孫、王正九代孫、王覽十代孫，這就證明智永不是改竄人”云云，但卻沒有出示能夠支持此推論成立的任何證據，他所認為的局外人都不知道或不曾代查王家家譜，故“記得清”王家之諱、把“覽”寫成“攬”字的就只能是王羲之的推論顯然是想當然的說詞。他甚至還斷言連智永“也記不清了”王氏家族的世系祖宗名諱，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智永也忘記那昔日具有王馬共天下的輝煌無比的簪纓家史了，而那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對於他據此而得出的“證明智永不是改竄人”結論，我們不能不說這種推論方法在邏輯上是難以站得住腳的。）周紹良先生《從老莊思想論〈蘭亭序〉之真偽》一文（收入《紹良叢稿》。齊魯書社，1984年）云：“按，閱覽之‘覽’與延攬之‘攬’，含意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但《蘭亭序》中的‘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與‘後之攬者’兩‘攬’字，均當作‘覽’。以王羲之的學問，不會用錯，這裡寫作‘攬’，顯然是有原因的。這便是：王羲之曾祖名覽，所以他改寫‘覽’為‘攬’，以避家諱。這和王羲之一些書札中凡端正之‘正’俱改用政事之‘政’以避其祖父王正之諱是一樣的。在這點上，如果是作偽者，絕不能想到這樣縝密，連家諱也俱避而不書，以保證其真實性。所以這是有力的內證，說明《蘭亭序》無疑出於王羲之之手，而且由這兩句，說明後半段確實是王羲之之作而無須懷疑。”（按，周紹良此論與周傳儒頗近似，前半部份有關的議論本無可非議，唯後半部分所下之結論，頗近武斷。首先，周之‘正’與‘政’避諱說有誤，詳注（19）。其次，周猜測作偽者絕對想不到利用人之家諱作偽的招數，這大約就是郭沫若所譏諷的“太天真的看法”吧。按，清人周廣業在論及古代文獻中出現應諱而不諱現象時，曾總結了四條原因，詳注（8）。其中一條就是“假託前人”，即利用避諱來假託前人文字乃後人造假之慣用技倆之一。周此說實欠謹慎，根本無法證明其“無疑出於王羲之之手”的結論能以成立。其三，周謂：“連家諱也俱避而不書”的“空字”避諱之事實並不存在。事實上，《蘭亭序》不管是誰書的，都沒有“避而不書”，而是用改字“攬”以書之。）

按，以攬代覽為避諱的說法亦多見於前人，而以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卷三十五“王羲之”條引證最詳，現錄出其有關部分，以資參考。（引文中又加引文，繁復過多，故不一一施加單、雙引號）周云：“周世授《夢餘日札》：班《史》省書覽涕，覽全攬，拭也。右軍《蘭亭敘》，後之攬者，以覽為攬，避其家諱也。章世豐曰：覽與攬音全義別，右軍確是避王覽諱。《漢書》應是攄，傳寫偽溷耳。廣業按：《蘭亭敘》攬字兩見，每攬昔人興感之由，亦從手旁。（以下為小字註文）張懷瓘《書斷》云：序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別

構體。亦不盡然。唐懷仁《集聖教序》載高宗御札云：內典諸文，殊未觀覽。高宗書覽字，不應從手旁，特王書更無覽字耳。《說文長箋》乃云：蘭亭記作攬為俗，又全覽，本作盥，謬甚！”

前人雖已注意到覽、攬避諱，然即使於避諱學精博如周廣業者，亦對諸如“覽與攬音全義別，右軍確是避王覽諱”之類明顯有悖於當時避諱實情的說法，採取敷衍了事態度，不作深論。蓋周囿於陳說而不敢懷疑《蘭亭序》真偽故也。至於所謂“攬”與“覽”同義之論，筆者之說詳注(7)。

在談論避諱字時須要先明確一個前提，即王羲之究竟遵不遵守避諱之禮？雖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人卻以為魏晉名士放浪不拘儀禮，於諱亦然。如周廣業《彙考》卷二謂：“案，魏晉以來，以父字為戲者甚多，禮教淪喪，即此可見。”其實未必盡然。按，晉人重諱而士族尤嚴，實所謂“今人避諱，更急於古。”（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二風操篇六。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3年），“六朝時最重犯諱”（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一。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年），“避諱至晉，漸臻嚴密”（陳垣《史諱舉例》卷八“晉諱例”條。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六朝士族最重家諱”（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文，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者是也，此已成史家常識，不煩贅辭。至於周氏謂魏晉人有以父字為戲現象，本不足怪，因為在當時無須避字。詳注(10)。

此外，日本江戶時代著名書家市河米菴(1779-1858)亦曾對此有避諱說之議論。他在其著《米菴墨談》卷一“蘭亭序”條中謂：“又‘覽’之作‘攬’者，乃右軍為避曾祖覽之諱而加‘手’。類此者《十七帖》中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之‘正’作‘政’例，是為避其祖父諱也。或‘正月’又作‘初月’、‘一月’等，皆為此故也”。（中田勇次郎校注《米菴墨談》，平凡社，1984年。）

- (4) 按，關於士大夫避諱究竟止於幾世，尚不知其詳，然東晉琅琊王氏一族，乃強勢豪族之家，禮教尚嚴。雖不能確知其家諱盡於幾世而祧，然推測王氏一族當有以古禮教治家之傳統，大約不謬。王羲之父曠、祖父正、曾祖王覽。王覽為王右軍曾祖，下高祖而居四世祖位，若右軍避“覽”，則說明王氏家族確實遵守“古人五世親盡”之禮。

嘗以此事與劉濤先生商討。劉以晉人犯諱之例多止於父祖，避祖父以上諱例所見不多，遂疑當時士族避諱盡於三世，若然，王羲之也許不必避曾祖“覽”諱云。筆者以為劉之所疑不無道理，然遍檢王右軍尺牘文字以及其他詩文，不見第二個“覽”字，這能否說明王羲之是在儘量迴避不用“覽”呢？至於當時士族避諱究竟止於幾世，因尚無直接證據証明，只得闕疑。又，近得一間接證據，雖然不能以之證王家亦可同之，要其為避曾祖輩之一例，不可忽視。其例如下：《宋

書》卷六十一記劉敬先：“本名敬秀，既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按，褚秀乃廬陵王劉紹妃之祖父。起初因廬陵王劉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為嗣，紹亦無子，以南平王鐔子劉敬先為嗣。褚秀乃外戚，不在國諱例，然在敬先即屬曾祖輩，以內諱當改名。

- (5) 見宋王彥輔《塵史》。《筆記小說大觀》本。臺北：新興書局，1975年，第六編二冊。

- (6) 關於“攬”字的提手旁是否為後人後來加上的問題，日本的杉村邦彦教授曾向筆者問及此事，他說不一定是後人所加，或即為王羲之酒後不留神先寫出了“覽”字，後來覺得不妥（因為未避諱），遂加補了提手旁云。我對此的看法是：若“覽”字真須避諱，則自幼經受過嚴格庭訓的王右軍，會對祖諱銘記於胸中，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不留神”的疏忽。此可參考本文所附《魏晉士族犯家諱實例表》諸例，皆可證之。

關於認為《蘭亭序》可能個半真半假的東西之看法，乃劉濤先生的說法。劉濤先生寄筆者電子郵件中談及他的看法時說：“我一直不排除《蘭亭》是一個半真半假的東西。所謂真，相信這種體式王羲之時代存在；所謂假，經過後人的加工，有局部的改變。”

- (7) 欲知“攬”字是否包含“覽”義，須先考察在中古時期“覽”與“攬”是否有過可以互假為用之例。以管見所及，此事於漢已不多見矣。今僅就管見所及，談談看法：

首先，日本近代有澤田東里在其著書《蘭亭字原考》（西川寧主編《日本書論集成》第二卷所收文化十三年（1816）經本塾刻本。汲古書院，1978年）中“攬”字條下謂：“按，覽、攬古通用。《莊子·在宥篇》：‘攬三王之利’，右軍蓋本之。”按，澤田氏引《莊子》文為說，於文字學似有以古說今之嫌。今據《莊子集釋》（郭慶藩校本，中華書局，1973年）卷四下《在宥篇》第十一全文如下：“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豈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伐幸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分有餘喪矣。悲夫，有士者之不知也。”《莊子集釋》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註云：“此攬音覽，本亦作覽。”澤田氏說蓋本此。

按，《經典釋文》註之“本亦作覽”疑原當作“一本亦作覽”，“一”字刊落。若然，則知《莊子》原作“覽”，後因傳抄致混作“攬”也未可知。即使如原來即作“攬”，今重讀此文，斟酌其義，知莊子“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句中“攬”字，其義似未必非讀如“覽”而不可。晉郭象註此句義云：“此為徒求三王

之利而不見其為之患也”，唐成玄英疏亦解釋此句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不知為喪身之大患也。”，皆以句中“攬”為求取義解，與陸德明之說有異；至於陸德明何以有是解？當作如是觀：凡先秦文獻，文字本多通假現象，此為學者習知。漢代以降，文字漸趨規範標準，即所為“隸定”以來，通假現象次第減少。於是原來可以一字兼數義以為用者，至漢代已鮮矣。陸氏蓋釋先秦舊典，厥有是說。今略拾漢代諸碑刻中之“攬”“覽”二字用例試以觀之，如“攬”字，《衡方碑》作：“攬英接秀”，不假“覽”；又如《校官碑》作：“外覽百家”；《魯峻碑》作：“博覽群書”；《夏承碑》作：“兼覽群藝”；《祝睦碑》作：“無不物覽”；《張遷碑》作：“披覽詩雅”；《堯廟碑》作：“博覽眾文”，以及晉碑《鄭烈碑》作“親覽萬機”，亦不假“攬”。據此知“攬”“覽”漢代已不混用，遑論魏晉哉？

其次，周廣業《彙考》引“周世授《夢餘日札》謂：班《史》‘省書覽涕’。覽全攬，拭也”為說，以證“覽”有“攬”義，這就屬於是未經過深究而草率得出的結論。按“覽”“攬”二字，早在屈原作品中就屢見不鮮，使用區別亦十分明確，如“朝搴”“夕攬”之“攬”與“皇覽揆余初度兮”之“覽”等，絕不混用。茲以下之兩點以辨周誤：一，所謂“覽涕”本即作“攬涕”，語出《楚辭》“思美人兮，攬涕而佇眙”，以其恆為後人引用之故，遂成名語。如《文選》所收《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之“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三良詩》之“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北征賦》之“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皆是，李善註之均引《楚辭》此句，以示其典出源緒。此外還有鮑照之“含歌攬涕恆抱愁，人生幾時得為樂”（《擬路難行》）及李白之“攬涕黃金台。呼天哭昭王”（《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等，用之者不可勝計，而絕少有作“覽涕”者。二，由上可知其原來本不作“覽”，而《後漢書》卷四十二之此處所以作“覽”者，疑係傳寫或鐫棗之偶誤所致，後人註書，遂云彼此相通。此類訛誤常見於古籍中，舉一最明顯的例子。《淮南子·要略》有“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橋掇，浸想宵類”，“覽”“攬”二出，均作攬取義用。可見一句中同字竟詛誤若是。蓋文獻經歷代輾轉抄寫以及重刻翻刻，點畫失真，魯魚亥豕，勢所難免。故論字形者，應以當時之寫本或石刻等實物資料為驗，例如漢魏晉代諸碑刻以及抄本木簡等實物。

附帶說明一下，前人亦多以此類所謂互通之用法為不當。如清初趙吉士亦即認為這種用法“於義無當”，他在論及後人不解“攬”意而襲用之弊時云：“後人不知相據，用之以為古，不知其於義無當。”（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十二卷，清康熙間刻本。）而於現今，即便認為《蘭亭序》為真，以“攬”字為王羲之為避“覽”諱而書之證的學者們，也都承認“覽”、“攬”二字義不同，不得混用。如注（3）引周傳儒先生《論〈蘭亭序〉的真實性兼及書法發展方向問題》云：“觀覽之‘覽’，與延攬之‘攬’，意義迥別，不可混淆”，周紹良先生《從老莊思想論〈蘭亭

序)之真偽》云:“按,閱覽之‘覽’與延攬之‘攬’,含意不同,不能互相代替”即是(均見注(3))。

這裡再順便介紹一下日本方面的觀點。日本近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幸田露伴於1937年在其撰寫的《蘭亭文字》一文中,也注意到了手旁“攬”字於文中其意難通的問題,頗覺不可解。最後他只好說:“義之果然是以此攬字用如覽之意嗎?若真是這樣,那就不太妥當了。”(《露伴全集》第九集所收。岩波書店,1951年)此外,繼澤田東里之後,源川進先生在《蘭亭字原考》的基礎上作《擴蘭亭字原考》,其中對澤田氏的“覽”、“攬”互通說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從《蘭亭序》文脈來看,二者不能通用。(《二松舍大學論集》所收。二松舍大學,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

- (8) 周廣業在論及古代典籍中出現的應諱而不諱的現象時,總結了四條原因:一曰體製攸關;一曰刊落不盡;一曰校寫訛易;一曰假託前人。(《彙考》卷六)所謂“假託前人”,即指前人文字可能被後人利用避諱來造假。
- (9) 《通典》卷百四禮篇六十四“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周·晉”條引舉主要諱禮如下: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教學臨文不諱;大功小功不諱;入門而問諱等等。且引註頗詳。(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又清周廣業《彙考》卷三以及虞萬里《先秦諱禮析論》(《文史》第四十九輯。後收在《榆枋齋學術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於此亦皆有詳細引徵論述。可以參考。
- (10) 關於王右軍父子名何得以不諱“之”一事,清人周廣業對此現象的解釋是:“‘之’是語助,二字作名,所重原在上一字。然父子祖孫,名皆連‘之’,有如昆季,亦所不可也。”陳寅恪以為此事實與琅琊王氏世奉天師道有關,他在《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論道:“蓋六朝天師道信徒之以‘之’為名者頗多,‘之’在其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曇’、‘法’為名相類。東漢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譏二名之義、習用單名。故‘之’字非特專之真名,可以不避諱,亦可省略。六朝禮法,士族最重家諱,如琅琊王羲之、獻之父子同以‘之’為名,而不以為嫌犯,是其顯著之例證也。”(此文亦收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又云:“六朝人最重家諱,而‘之’、‘道’等字則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雖不能詳知,要是與宗教信仰有關。”(同上)陳氏此說影響極大,爾來多為論者引用。如逍遙天即是主張此說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其著《中國人名的研究》“南北朝名字的宗教氣氛”條中,引清趙翼《陔餘叢考》之“元魏多以神將為名”條後議論道:“按,趙氏所提,有倒果為因之嫌,事實上元魏的這種命名,乃受漢人的影響。自漢季佛法東漸,至六朝而盛,張陵的五斗米道也於此時盛

行，故當時的知識分子，思想多是仙佛聖賢雜糅，命名也受影響，小名已不少僧哥、摩訶之類。觀《南北史表》，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僅次於‘之’字，如烏丸王氏有僧辯、僧智、僧愔、僧修。瑯琊王氏更不避同名之諱……。”（香港·檳城教育出版公司。1970年）我以為六朝人名雖然帶“之”者多與宗教有關，然亦有無關者，不能一概而論。陳氏指出了這一現象也許與宗教有著某種關係，但這也只能是疑似，並無確證支持，即陳所謂“所以然之故”、“不能詳知”者是也，未可遽定。按，義之獻之父子名同“之”而不嫌者，或可以從其“名二字”之虛實與“不偏諱”兩方面尋找答案。

所謂虛實，上引周廣業說以為“‘之’是語助，二字作名，所重原在上一字”，陳氏說以為“‘之’字非特專之真名、可以不避諱、亦可省略”之說，均以為“之”乃虛字，亦可省略，不必重視。按，此說確為事實，其例可從文獻中得證者甚夥，如劉隗彈劾義之兄王藉之，《晉書》卷六十九劉隗稱“王藉之”，而《通典》卷六十引劉隗彈劾文則稱“王藉”即是其例。至於所謂偏諱，詳本文“避諱的由來及與本論關聯的問題”一節。

又，陳寅恪“六朝人最重家諱，而‘之’‘道’等字則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雖不能詳知，要是與宗教信仰有關”之說，或者不謬，然據之以證以下事例，則似覺有難圓其說處。據上述王氏名譜，知名同“之”者輩乃自王羲之世代開始，而《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附擬之傳載：“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擬之彌篤”，“世事”者則應指王擬之以上之世代事五斗米道而後可。然王氏一族上下以王羲之這一代為分界，上世人名中并不含“之”，反倒是以下至五、六世代名皆同“之”字。若依陳氏的“之”乃天師道信教記號之說準之，則當以王羲之以下之世代事五斗米道方合其說。又，陳氏以為非止於名中含“之”，即“道”等可不避諱之字亦有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曇”“法”為名相類云。這也許出於以下兩種原因而不避諱，不一定與宗教有關：一是古人避諱只限於名而不及其姓（孟子云“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與字，一是“二名不偏諱”。關於不諱字，其例多不勝舉，如王羲之岳父郗鑒字道徽，其孫郗恢字道胤（可不避祖字）；孫女則名郗道茂（即使祖字當避，此二名，可不偏諱）即可證。再如陳垣舉例論及“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現象時只說：“此南北朝風也”（《舉例》卷五）而未說明原因。其所舉王羲之一族例已如上述，此外他還舉了不避“僧”字例。如宋王弘子僧達，孫僧亮、僧衍，從子僧謙、僧綽、僧虔，從孫僧祐等例。其實這些應該視為“二名不偏諱”之例，即使如此，也僅僅限於叔侄，未見父子直系。（按，家諱一般只限於直系，不及旁系。非直系者，有時甚至還有子孫與曾祖叔伯重名亦不為嫌之例。如羊祜從兄名祉，其六世從孫亦名祉；祜姪名忱，六世從孫祉之子亦名忱。分見《晉書》、《魏書》

祜、祉傳。又如王彬子王彪之、王興之。然彪之四世裔孫亦名興之。皆其例也，故此事不可與直系混為一談。）如果王氏之單名者如“弘”“孺”“錫”“遠”等，亦為其子孫所犯，則可謂其“不嫌同名”，而事實上並未見此例。

此外，陳垣還舉出南北朝人不諱“字”例，以為奇異，然此似亦不能證明“不嫌同名”乃“當時風尚”。案，古人一般諱名而不諱字，陳氏未察，故有此失。周廣業《彙考》卷二：“《禮記正義》，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其驗也。”又《顏氏家訓》卷第二“風操第六”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後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可見古人原本并不諱字，非但不諱字，甚至還有子孫以父祖字為氏的傳統，疑南北朝祖孫父子不嫌字即承此遺風而來。以晉代來看，雖然偶有諱字之事，如《家諱表》(9)(16)(17)例。然多不十分鄭重，戲謔成份很濃。究其原委，誠如《顏氏家訓》所謂江南至今不諱字之故。在此，更舉例以證實此說確為事實。除了上面已舉的郝氏祖孫例外，最著名的莫過於王濛之例了。濛父名納字文開，《晉書》卷百九十三濛傳載濛：“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又如《太平御覽》三七六引何法盛《晉中興書》記：“晉胡母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亦不怪。”此外還有王導字茂弘，其曾孫王弘不諱曾祖字；明帝敬導若長尊，見之但稱其字“茂弘”（《晉書》卷三十五王導傳）而諱言導名，為了避導生諱甚至還特意下詔令：奏事不名。（避生諱之習慣起於漢代。如《史記》諱“徹”改“通”、《漢書》諱“莊”改“嚴”。）可見字本無關乎諱。這類例子甚多，關於此事，筆者將另以專文詳論。

- (11) 陳垣認為：“唐以前避諱，多用改字法；唐以後避諱，改字缺筆，二法並用。”（《舉例》卷六“已避諱而以為未避諱例”條）今人虞萬里論及唐代避諱形式時說：“唐代避諱形式有代字、省字、缺筆、變體等。代字之法，古已有之。省字之法，亦有前承。”（虞萬里《榆枋齋學術論集》“唐五代字韻書所反映之唐代避諱與字形”一節。）他也認為唐以前主要只有代字、省字之避諱形式。筆者認為，所謂缺筆、變體之法，實際上都屬於一種避諱形式，就是增損諱字之形以達到避諱目的之法，損即缺其筆劃，增則加其偏旁，“攬”即屬於後者。隋唐以前雖然偶有其例者，然普遍使用此法之時代，不應早於隋唐。江彥昆在其編著的《歷代避諱字匯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的“前言”中，對中國歷代避諱方法作了更為詳細的總體歸納：1作某；2標諱；3省闕；4代字；5改稱；6缺筆；7變體；8更讀；9曲說；10填諱。其中“代字”與本論有關，節錄

江對“代字”的解釋如下：“凡遇必要避諱之字，改以它字代替，以同義字為最常見。……此外，隋唐以前，尚有以音同音近字代諱字的：司馬遷父名談，《史記》因稱張孟談為張孟同……南北朝宋范曄父名泰，而《後漢書》改書郭泰作郭太。……又後世間也有以形近字代諱字的，如唐高祖李淵父名昺，兼避嫌名秉，而《北史·崔鑒傳》改崔秉為崔康……即取形近。”

- (12) 一，關於晉愍帝之諱名究竟是“業”還是“鄴”，因文獻記載頗有混亂，遂致影響人們對當時避諱情形的判斷。按，此事頗關諱字之改字方法，應當予以澄清。周廣業《彙考》卷十晉“孝愍皇帝諱業”條考定晉愍帝之諱當為“業”字，是。又後世人多以為晉元帝司馬睿都建業（今南京）時，因避愍帝鄴諱而改都名建業為建康，非也，應作改“建鄴”為“建康”，因為晉武帝時建業已改作建鄴。按，孫吳時孫權改秣陵為建業（見《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後晉武帝平東吳後，又改還為秣陵，並於太康三年（282）分秣陵北為建鄴，改業為鄴。後人如司馬光《通鑑考異》，王楙《野客叢書》卷九“古人避諱”條（王文錦點校《野客叢書》。中華書局“學術筆記叢刊”本，1987年。），周密《齊東野語》卷四“避諱”條（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中華書局“唐宋筆記史料叢刊”本，1983年。）均承此說。近人陳垣《史諱舉例》卷六亦引《冊府元龜》三所記晉“愍帝諱鄴，字彥旗。建興元年即位，改建鄴為建康，改鄴為臨漳。”（此處陳乃略引，今據《冊府元龜》原文抄錄。中華書局，1960年）為據，駁清人黃本驥《避諱錄》（《三長物齋叢書》所收）之“晉愍帝名業，改建業為建鄴”說之謬。按，黃以愍帝名業之說其實不謬，然改建業為建鄴之說則顯然不對。而陳氏信《冊府元龜》所記晉愍帝名鄴說而未能詳考，亦其失也。又最近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名避諱考》“建康縣”條也依然主張此說（李德清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關於此事，清人周廣業已經考之甚詳，茲不贅敘。總之，不管鄴、業孰後孰先，是因為鄴與業不能互代才改作建康的。

二，關於鄴縣（今河南邯鄲臨漳縣）之改臨漳。按，晉干寶《晉紀》中有“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清湯球輯，喬治忠校注本《眾家編年體晉史》所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據此知晉時“鄴”不能代“業”。關於以上兩點與避諱關係之詳考，可參見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十晉“孝愍皇帝諱業”條。

- (13) 《通典》卷一百四，禮篇六十四“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晉”條引晉人有關避諱議論云：“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尚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詁，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按輒關博士王質、胡訥、許翰議。按《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

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恆也。《周禮》謂之五嶽，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之別，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14) 陳登原著《國史舊聞》卷二十一“嚴家諱”條。臺灣·大通書局，1971年。

(15) 雖然古禮有“臨文不諱”(《禮記·曲禮上》)之說，但那只是指念讀古書時遇到諱字可以不避，絕非指在自撰文中也可以犯諱。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一“避諱”條論“臨文不諱”云：“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

(16) 周廣業曾說：“然畢竟避者十九犯者十一。劉晝新論謂：論事皆取其多者為節。今摘一二語為左證，以概量全書，是探華陽之溫泉便忘水冷；附蕭邱之寒餒，不言火熱也。可乎？”(《彙考》卷六)

(17) 《老學庵筆記》，中華書局，1979年。《雲谷雜記》張宗祥校本。中華書局，1958年。《齊東野語》前出。

(18) 參見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

(19) 按，這裡說名詞的“正”不混“政”，指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此，凡事不能排除特殊情況的出現。如《漢書》卷四十三陸賈傳有“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註曰“正亦政也”。如果當時“正亦政也”不特殊，大概也不必註出了。這種特殊情況的出現與古籍輾轉傳寫和雕板訛誤有關，應該目驗當時人手寫的文字實物資料，如石刻以及竹簡帛書等，不可一概而論。

另外，這裡須要說明的是，關於作為名詞意義上的“正”，若從詞類的嚴格分類上講，此“正”字應是形容詞。但這裡列舉的都是最終構成了名詞詞組，所以，為了減少因概念繁雜引起的行文混亂，這裡姑且把“正”當作名詞意義上的詞匯來處理，不再細分了。

順便提一下，注(3)引周紹良先生論王羲之避“正”諱改“政”曰：“王羲之一些書札中凡端正之‘正’俱改用政事之‘政’以避其祖父王正諱”云。按，此說不確，今檢王羲之尺牘，未見類似“端正”之名詞意義上的“正”被寫作“政”。

(20) 1980年)以及清嚴可均輯《全後周文》卷十三“庾信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第四冊。中華書局1999年第七版)。

(21) 可參看清王念孫《讀書雜誌》一“政”條。《大戴禮記·用兵》“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22) 王羲之法帖文中多出現“征”字，如唐褚遂良《右軍書目》第四《周公東征》帖，張彥遠《右軍書記》所收155《數得桓公問帖》云：“胡云征事未有日”，123《得征西近書帖》云：“得征西近書，委悉為慰”，417《孔侍郎著作帖》云：

“王征東郎最言”等皆是。(分別收在《法書要錄》卷三、卷十。范祥雍點校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又，《法書要錄》卷十所收《右軍書記》的法帖編號，系依中田勇次郎編著《王羲之》中所整理的《右軍書目》法帖編號。講談社，1974年。) 又，清人周廣業以《禮記·月令》“征鳥厲疾”之“征鳥”當秦人避“正”諱而加人邊以成者。周引《儀禮·大射禮》註“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而證“征鳥”即“正鳥”，秦儒避諱加立人旁。進而推出“此諱改字變音及加減偏旁之始”的結論。((《經史諱名彙考》卷五)按，加偏旁改字者未見於他例，若此說果然，則僅此一例而已(這裡姑且不說是否因古籍輾轉傳寫和雕板訛誤致此)。在秦時此二字本互通，其例甚多，此事已為周書引徵證明。而於此忽然又謂“征”乃秦儒為避諱所加，又是孤證，其說似近牽強。至於改字變音之說，如本文所述，陳垣基本上否定了其嫌名或改音諱字的可能性。虞萬里對周之“此諱改字變音及加減偏旁之始”的結論也持疑問態度，以為秦既然改正月為端月，似無必要改音，況秦漢之時有無四聲尚成問題，他認為“秦漢有無四聲，以及秦漢即使有四聲，其時是否已能自覺、明確地區分，並以之運用於避諱，此乃較為玄虛之問題”，並認為對此“實以不作肯定回答之為近實”。(虞文《避諱於古音研究》。《榆枋齋學術論集》所收)

- (23) 陳垣《舉例》卷一“避諱改音例”條曰“昭有韶音，唐人以為避晉諱，亦非也。”及卷六“非避諱而以為避諱例”條曰：“昭有韶音，非為晉諱”。
- (24) 分別參見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十及虞萬里《榆枋齋學術論集》“避諱與古音研究”一節。
- (25) 陳垣《史諱舉例》序云：“嘉慶間，海寧周廣業曾費三十年歲月，為避諱史料之搜集，著經史避名彙考四十六卷，可謂集避諱史料之大成矣。然其書迄未刊行，僅蓬廬文鈔存其敘例，至為可惜。”
- (26) 遂欽立先生對此問題有詳細考論。見遂欽立《〈蘭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寫的》一文。遂欽立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所收。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